

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刻板印象分析

黃妍甄*

《摘要》

軍公教年金制度往往成為政黨之間的爭議問題，在此種社會氛圍下，不但突顯了各職業類別的差別待遇，同時也導致民眾對於軍公教工作者，往往形塑出較不友善的態度，甚至形成負面的刻板印象，造成民眾之間的對立與不理性的批評。「瞭解我們面對問題的態度，遠比瞭解問題本身來得重要」，因此，本文希望能夠過量化資料分析與焦點座談並行的方式，以探討民眾對於軍公教的態度及其形塑的過程。希望能弭補學術上較少探討的態度議題，同時，也作為改善職業鬥爭的重要參考，降低民眾對於軍公教的誤解，以營造出友善的社會環境。

而本文發現，民眾對於不同職業類別工作者的態度具有明顯的差異，對於軍公教者多偏向較負面的看法，多認為他們是屬於國家較照顧的一群人，但對於社會的貢獻度則相對較少。主要是因為在社會環境的變遷下，相關制度缺乏與時俱進，反而突顯出了軍公教所受到的優渥待遇，更導致了社會上的職業對立與不理性的批評。更詳細來說，民眾對於軍公教三者的態度仍具有顯著的差別，以軍而言，泛藍支持者較偏向正面的評價，反之，泛綠支持者則不然；公務人員的部分，雖偏於負向的態度，但近年來之態度則有漸漸地好轉。而教師則往往被賦予極高的社會評價，但身為第一線的教育人員，卻感受到師道日微的無奈。而民眾對於上述的態度與想法，多源於家庭政治社會化的效果，學校與朋友的影響力則相對較小。值得注意的是，大眾媒體所產生的影響力乃不容小覷，過度強調職業間的對立與不平等，而流於「以偏概全」的謬誤中，導致民眾對於軍公教產生敵意的看法，是現今軍公教形象嚴重低落的重要原因，雖然大眾媒體責無旁貸，但該如何塑造出友善的社會環境，則是大眾應努力的共同目標。儘管不同職業之工作者對於社會的貢獻有所不同，也享受到不同的利益，但不可否認地，社會上不同職業的工作者，對於社會都有其一定的付出，唯有尊重彼此，才能營造出對友善的職場環境，共創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字：政治社會化、軍公教、反官僚、刻板印象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email: 107256501@nccu.edu.tw。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1979 年起軍公教年金制度正式開始施行，而隨著政黨輪替的頻繁，軍公教年金制度往往成為政黨之間的爭議問題，年金制度問題的爭議也持續至今，2016 年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蔡英文總統即正式成立年金制度委員會，加以推動符合現今環境所適用的最佳改革方案，期盼能營造出對不同職業類別工作者一個公平有善的工作環境。不可否認地，當時軍公教年金制度的設立，有其歷史、政治及經濟層面的考量，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在社會環境的變化之下，軍公教的相關制度缺乏與時俱進，因此，不只政府開始正視此一問題，越來越多民眾也開始致力於年金制度的改革，分配正義與世代正義的問題一再受到民眾所批評。同樣的，民進黨也一直將其他職業與現有的軍公教年金制度相提並論，在此種社會氛圍下，不但突顯了兩者間的差別待遇（傅立葉，2000；黃耀滄，2008），同時也導致民眾對於軍公教工作者，往往形塑出較不友善的態度，且偏向負面的看法，甚至形成負面的刻板印象，造成民眾之間的對立與不理性的批評。此外，民眾對於軍公教的態度往往一概而論，事實上，軍公教在本質上其實具有十分大的差異，應分別探討以更瞭解民眾對於三者職業類別的看法，冀以作為年金改革的重要參考。而 105 年 9 月 3 日的軍公教大遊行也以「反污名要尊嚴」作為其遊行的主要訴求[†]（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2016），顯見，軍公教仍感受到社會大眾所加諸的負面看法。然而，過去對於軍公教年金制度的研究，多聚焦於其歷史、政治、經濟與法律層面的影響（黃耀滄，2008），至於，民眾對於軍公教態度的層面則較少著墨，也缺乏相關實證研究，多流於大眾媒體的流言蜚語。故作者乃希望能藉由實證資料的分析，來弭補學術上較少探討的態度議題，同時，也作為改善職業鬥爭的重要參考，以營造友善的社會環境，共創社會的和諧。

誠如 Jiddu Krishnamurti 所言：「瞭解我們面對問題的態度，遠比瞭解問題本身來得重要」，因此，本文希望能透夠量化資料與質化分析並行的方式，探討軍公教議題下大眾的政治態度與意見，即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刻板印象及其形塑的過程。具體而言，本文主要問題即在探討：民眾對於不同職業工作者的態度差異。長期發展之下，對於軍公教整體的刻板印象為何？分別來看又是如何？而民眾究竟是透過何種管道形塑此種想法及印象？首先，文中將檢閱軍公教刻板印象的相

[†] 軍公教大遊行向政府共提出十大問題與五大訴求，具體內容如「沒有財政紀律，哪來年金改革？」及「行業不平大砍軍公教退休所得，勞工所得會提高嗎？」等訴求，監督聯盟認為軍公教年金改革有其必要性，但不可過度強調職業類別間的差距，而使得職業間對立情況加劇，模糊原有的改革問題，而放任大眾對於軍公教偏向污名化的思考邏輯。

關文獻，並以「政治社會化」作為主要的切入角度，以更加瞭解民眾心中的想法。其次，透過量化資料調查與焦點座談的方式，以深入瞭解民眾的意見及其背後成因。最後，結論的部分則歸納本文的發現，希望藉由本研究能更加瞭解民眾對於軍公教既有的刻板印象，進而破除民眾對於軍公教的錯誤迷思，藉以思考我國民主發展方向，並創造出友善的政治環境。

貳、文獻探討

民眾對於軍公教的態度，往往影響他們對於軍公教政策的論點，甚至成為行動的依據，本文將以民眾對於軍公教者的態度作為主要的分析焦點。而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理論，則對於個人政治態度與價值形塑的過程給予了全面性的解釋。更詳細來說，Conover（1991）又將政治社會化理論分為宏觀面與微觀面，前者乃將國家視為主要的影響管道，政治環境與系統變遷的民主演進，皆會對於民眾產生全面性的影響，甚至成為引導政治社會化的關鍵力量，然而，在社會環境的複雜化下，宏觀面研究必須考量到許多歷史與政治因素，且牽涉到「世代」集體意識的形成，因此，在成本與研究目標的考量下，本文乃以微觀性的角度為主。而微觀性面的政治社會化則多聚焦於個人於政治社會化中，各種管道的影響力與個人態度的培養，具體而言，家庭、學校、朋友、大眾媒體皆是重要的影響媒介（agencies），故以下將針對各媒介的影響力與形塑過程做更進一步的介紹，冀以瞭解民眾態度的培養與形塑的過程。

一、父母是孩子認識世界的第一所學校

許多學者皆認為家庭乃是政治社會化中最重要的影響媒介，不只扮演著態度形成的基礎，更是引導民眾態度、價值的主要管道（Hyman, 1959；Westholm and Niemi, 1999；劉嘉薇與黃紀，2012）。由於家庭是孩童第一個所接觸到的社會系統，同時，也是接觸時間最長的社會網絡，因此，父母在教養過程中經常會無形地傳達個人的理念與想法，形成世代傳遞的效果，更「內化」為孩童價值判斷的參考依據（Chaffee, 1972）。而本於內心的依賴效果，孩童經常會以父母作為主要的行為偶像，導致想法往往與父母趨同，並且塑造出較接近的價值觀（吳乃德，1999；鄭宏文，2011）。Jennings 和 Niemi（1968）則透過追蹤調查（panel）的方式，來加以檢驗家庭對於孩童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力，結果顯示，家庭教育對於政治態度的形成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同樣的，Zuckerman、Dasovic 與 Fitzgerald（2007）

亦針對父母與孩童的政治偏好來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孩童與父母的觀點往往十分接近，即便並非完全相同，但也不至於抱持著相反的論點。而劉嘉薇與黃紀(2012)則對於家庭的影響力做了更進一步的闡述，研究指出，家庭教育對於態度的養成有所影響，但父親與母親所產生的影響力則不盡相同。由於母親往往承擔較多的教養義務，且投注較多的心力於陪伴孩童，互動機會自然也隨之增加，故母親對於孩童的影響力往往相較於父親更大，此一結果也與許多國外研究不謀而合（Jaspers, Lubbers and De Vries, 2008；Mayer and Schmidt, 2004），顯見，在家庭教育中，母親對於政治態度的養成具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力。

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女權意識的高漲，越來越多家庭主婦轉而投身為職場婦女，不只使親子接觸的時間有所降低，也導致互動機會的漸少，而此一趨勢勢必成為我國社會的發展動向，是否會造成家庭的影響力有所降低，則有待日後的研究調查。此外，延續家庭之後，學校是民眾第一個所接觸的正式管道，因此，對於政治社會化亦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二、教育是社會的縮影

學校提供了正式與非正式的傳播管道，透過教育互動的方式，將政治價值有意、無意地傳達給學生。學校氛圍成為了左右態度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致力於討論師生互動模式、教學方式與學校風氣等各層面的影響力與運作（陳陸輝和黃信豪，2007；鄭宏文，2011）。整體而言，在教學的場域中，教師扮演著最主要的價值傳輸者，不僅透過正式的課堂教授與課本設計，傳授個人價值、態度，同時，也經常透過與他人互動的非正式管道，分享個人的價值與政治態度，成為民眾對於教師印象的重要參考依據（Mishler and Rose, 2007）。而究竟教育對於個人政治態度的養成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力，隨著世代的變化，各家學者也紛紛提出不同的看法，傳統上，多數研究皆認為教育對於個人政治技巧與知識皆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力，甚至影響民眾政治態度與價值的依歸（Conover and Searing, 2000；Ichilov, 2004；劉嘉薇與黃紀，2012），而 Almond 與 Verba（1963）針對美國、英國、德國、墨西哥與義大利等五個國家進行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研究結果，教育所產生的效果不言可喻。相反地，在教育制度改變、自主性提高的情況下，教育體系已有所不同，對於傳統的論點也產了質疑，陳光輝與蔡奇霖（2010）指出學校在政治社會化的效果有漸漸弱化的情形，其中又以年長世代的影響力較為薄弱，但對於年輕世代的學生仍具有一定社會化作用。

三、同儕的影響力

除了家庭與學校的影響力外，同儕對於個人價值觀的塑造亦給予了強化或改變的助力，年齡相近以及興趣相符的朋友經常會透過結盟的方式，來尋求彼此的支持，其中又以青少年的影響力最為人所重視。Langton (1967) 依據同儕團體的組成性質做了更進一步的研究，若同儕團體的同質性高，將有助於強化原有的態度與價值，反之，異質性高的同儕團體，則會形成改變的力量。至於，同儕在政治社會化中究竟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力，在既有文獻中有不同的主張，Tedin (1980) 認為家庭與大眾媒體仍是態度決定的主要因素，而同儕僅扮演著強化的角色。然而，許多國內外研究皆主張同儕團體的影響力更勝於家庭，朋友間的輿論壓力與認同感的追求，皆有助於改變或強化原有的政治態度，並成為態度主要的塑造者，有助於轉化為實際的參與行動，其中，又以投票等特定議題，同儕的影響力會有所增強，成為政治社會化中最重要的影響媒介 (Harvey, 1972;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陳陸輝和黃信豪, 2007)。

四、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

大眾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原有地域與時間上的限制，傳統媒體扮演著設定議題、報導真相、提供資訊與監督政府的功能，並經常透過有系統的傳播方式，將政治訊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傳達給民眾，形成民眾的政治態度 (Graber, 2006)。而在商業化的發展下，傳統媒體傾向去服務資源擁有者及政治菁英，使得政治議題往往走向高度統一化的議題，以主流聲音為主，並成為政黨所動員的重要管道，對於民眾態度與價值的判斷起了引導的作用，在長期的接觸與刺激下，將有助於社會化的深根蒂固。同樣地，在商業因素的考量之下，大眾媒體傾向去報導較負面的新聞，以爭取較高的關注，一旦軍公教人員違背了社會大眾的期待，則往往容易被大眾媒體所誇大或渲染，以延續報導的價值，同時，也成為民眾判斷軍公教形象的重要依據。Dawson 與 Prewitt (1977) 則認為大眾媒體的影響力不宜高估，即便大眾媒體的接觸，對於政治態度的醞釀會產生引導的力量，然而其效力僅於加強而止，並無法改變原有的態度基礎。詳而言之，大眾媒體中，不同的媒介對於不同年齡者所產生的社會化效果也有所不同，相較於老年世代，電視對於年輕世代的影響力較為顯著，但報紙對於年輕世代的影響力則較不顯著 (Kraus and Davis, 1976; 鄭宏文, 2011)。然而，網路社群的出現，不只顛覆了傳統媒體傳播的模式，更改變了政治社會化的傳播途徑，對於年輕世代的政治社會化效果產生顯著的加強效果，民眾多流與網路上的互相「取暖」，反而降低對於不同意

見包容性，造成原有政治態度與價值的堅不可摧（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3）。因此，本文在探討民眾對於政治態度的形成時，亦將民眾對於大眾媒體的接觸頻率納入本文的分析架構，冀以更深入剖析相關變數的影響效果。

五、反官僚情緒的後果

綜觀上述可知，民眾態度的形成不只受到家庭、學校、朋友的影響，而大眾媒體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管道，在政治人物的操弄與媒體競爭的壓力下，大眾媒體往往訴諸於負面的報導，無形中擴大民眾對於軍公教的不滿情緒，形成反官僚情緒的高漲。Hubbell（1991）認為這種負面的官僚印象，可以成為政黨動員民眾的重大力量，藉由凝聚民眾的不滿與憤慨情緒以吸引選票，並作為政黨競爭的爭議焦點。此外，許多政治人物亦將政策失敗歸咎於官僚的怠慢、消極與無能，在民眾與官僚的互動過程中，往往又加深了此種想法，非但無助於解決真正的政策問題，反而使官僚成為代罪羔羊的替身，儘管重大事件的出現，有助於扭轉民眾對於官僚的負面觀感，如救災事件，但隨著時間推演，負面聲音往往淹沒了正面訊息的傳遞（Suleiman, 2003；陳敦源，2009）。

而 Goodsell（2015）則針對網路社群上與政府相關的言論作了更進一步的分析，其指出民眾對於官僚的負面指控，多流於毫無證據的不實指控，相反地，正面評價者則多傾向言之有據的發言，在這樣的發展之下，容易加深民眾對於官僚印象的誤解。以我國而言，洪美仁與黃建實（2016）則以內容分析的方式，針對 1988 年至 2008 年中聯合報、自由時報的內容進行深入剖析，結果發現，政黨輪替之後，軍公教相關的報導有漸漸變多，然而多以負面報導居多，接近九成，而在大多數負面的報導當中，又以風紀行為敗壞之新聞報導為主，如喝花酒、貪汙、酒駕等事件。這些少數表現不良的軍公教人員，往往造成民眾對於軍公教的觀感不佳，不但會降低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同時也會損及政府運作的品質與效率。簡而言之，在大媒體的渲染之下，往往無形中加深民眾對於軍公教的負面印象，同時，也傷害民主機制的運行。而上述的相關研究多針對大眾媒體的報導內容進行分析，雖能瞭解我國媒體運作的模式與影響力，但民眾對於軍公教的觀感究竟為何，則較少著墨，故本研究除了將針對各媒介的影響力進行探討之外，同時，也將更進一步探究我國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形象與態度變化，冀以創造出友善的社會環境。

參、研究設計

本文最主要的研究問題即是探討現今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印象為何，相關研究指出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印象往往一概而論，然而，事實上軍公教三個職業類別不僅在本質上差異極大，且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越來越多的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印象也有所改變。更詳細地來說，軍公教乃包括三種不同職業類型的民眾，軍乃指職業軍人，公為公務人員，教則是公立學校的老師，因此，除了概括式的分析之外，本文亦會針對軍公教之三類進行更進一步地探討，以檢視現今社會大眾對於軍公教之民眾的看法與成因。本文主要研究問題即是：（一）民眾對於不同職業類別工作者的態度差異。（二）民眾對於軍公教整體的印象為何？（三）民眾對於軍公教三種職業類別的刻板印象分別為何？（四）民眾究竟是透過何種管道形塑此種想法及印象？

本文的分析資料來自林聰吉（2016）所主持的科技部研究計畫[‡]，本文將藉由量化分析與質化研究並行的方式，以更深入剖析民眾的看法與形塑過程，以下將分別述之。

一、量化分析

在電訪調查中，主要乃針對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作為本次訪問對象，共抽出 1,303 位有效樣本。抽樣方式則採用隨機撥號法（Random Digit Dialing，簡稱 RDD），依照各縣市電話簿中電話數的比例，作為各縣市抽樣之樣本比例，並以隨機亂數的方式修正後最後二碼或四碼，以顧及電話簿中可能未涵蓋全體電話戶的問題。同時，採用戶中抽樣的方式，選定受訪者進行電話訪問，以增加樣本代表性。

本文所欲探討大眾對於軍公教三個職業類別的印象與態度，而軍公教與其他職業之工作者間的待遇差別，經常成為軍公教所被批評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在測量的部分，分別訪問民眾對於各職業類別之「無貢獻/有貢獻」、「沒受到照顧/有受到照顧」的看法[§]，而值得注意的是，職業類別的部分，除了軍公教三類之外，

[‡] 本文分析資料主要來自林聰吉（2016）。**精英動員與大眾政治態度的形塑：台灣民眾心目中的「軍公教」形象**。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MOST 104-2410-H-032-026-MY2），未出版。作者也在此致上最大的謝意，感謝林教授的同意與授權，以讓本研究能使用該份資料進行分析與探討。

[§] 此一題目的設計乃藉由語意差別分析法，針對大眾對於軍公教年金議題主要的論述內容與批

同時也納入其他職業類別一併討論，包括私部門職員、農民、勞工，以進行比較與分析。本文將透過線性迴歸分析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 OLS）**的方式來加以檢視各變項的影響力，同時，亦透過比較平均數的方式，以瞭解民眾對於上述六種職業類別的態度差異。而量化問卷的調查方式，雖能提高研究的信效度，並可以透過有系統的抽樣方式，進行大範圍的調查，以釐清民眾的一般性意見。然而，對於民眾內心的深層想法則較難瞭解，因此，為了針對民眾的態度做更深入地分析，本文將從電訪的 1,303 位成功樣本中，選取出受訪者來參與焦點座談，以進一步聚焦在民眾對於軍公教此一職類別工作者的態度，希望能在短時間內大量蒐集民意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透過焦點座談的方式，主要是希望相似性極高的民眾能夠過集體性的探討，來激盪出多元的意見，以在量化資料外，做更進一步地探究。

二、質化研究

質化資料乃以焦點座談的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以進行集體性的探討，而焦點座談的對象主要是來自電訪調查中的 1,303 位成功樣本。依照其職業類別（軍公教/非軍公教）與政黨認同（泛藍/中立/泛綠）加以分成六大類後，並以非隨機抽樣的方式邀請受訪者來參與焦點座談，分別針對泛藍非軍公教、泛藍軍公教、中立非軍公教、中立軍公教、泛綠非軍公教以及泛綠軍公教之民眾進行訪問，共舉辦六場（一場 2 小時）焦點座談，分別於 2016 年 8 月 13、8 月 14 及 8 月 20 日舉辦，總計成功訪問 44 位受訪者。

至於，焦點座談的具體訪問內容，則由概括性意見至小範圍的價值評判與其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而必須說明的是，本文雖以探討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刻板印象為何作為最主要的研究目標，但考量到為了避免誤導民眾，因此，在焦點座談過程中，本文乃詢問民眾對於軍公教的「態度」為何，以避免引導民眾偏向負面的看法，而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幾點：

- (1) 軍公教在我們印象中是比較特殊的職業。那整體來講，請問您對軍公教這樣職業類型的族群，整體而言的態度是什麼？

評所設計而成的題目。必須說明的是，考量到時間與成本因素，故作者僅以「無貢獻/有貢獻」、「沒受到照顧/有受到照顧」作為本文所欲探討主要變項。

** 本文乃藉由軍公教減去非軍公教的數值作為依變項，來加以檢視民眾對於軍公教與非軍公教間的正負印象之差異，此外，也納入職業、政黨認同、性別、省籍、年齡、教育作為自變項一併討論，以更瞭解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刻板印象及其影響因素。

- (2) 在軍公教職業類別的部分，更詳細來說，又可分為三大類別，軍是指職業軍人、公為公務人員、教乃指公立學校的老師。請問您對於這三個不同的職業類別，您覺得有什麼差異？以及您對於他們的態度分別為何？
- (3) 您這樣的態度與看法，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形塑？是如何形成的？是透過什麼管道？是透過怎樣的方式讓您有這樣的態度？

肆、研究發現

民眾對於政治事務的態度，往往受到家人、朋友與學校等各種社會管道的影響，許多研究亦指出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看法，不只受到政治菁英所引導，事實上，大眾媒體所報導該議題的數量與公眾對於該事務重要認知程度成正比，而此一態度又成為民眾的動依據(Abramowitz, 2011; Kimball and Gross, 2007; 左宗宏, 2008)。因此，除了剖析民眾的態度之外，其形塑的管道、經驗與背景亦可視為重要的社會基礎。

綜觀上述，本章節首先將說明量化分析的結果，希望能夠過大範圍調查，釐清民眾對於各職業類別工作者的看法與態度，以瞭解民眾對於軍公教者與非軍公教者的態度差異。其次，將透過焦點座談的分析資料，來聚焦探討民眾對於軍公教者的整體態度及變化情形。再者，則分別對於軍公教三者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更深入地探究民眾對於軍公教者三者的看法是「什麼？」。最後，則是回歸政治社會化的研究途徑，以瞭解民眾究竟是「如何」形塑出此種想法，作為改善職業鬥爭的重要參考。

一、各職業類別的態度測量與分析

由表一分析結果可知民眾對於各職業類別「貢獻度」的認知差異，民眾認為農民對於社會的貢獻度最高(6.89分)，其次則是勞工(6.42分)與公校教師(6.31分)，至於，其他職業則皆低於6分，分別依序為軍人(5.90分)、私部門職員(5.75分)，最低則為公務人員(5.58分)。整體來看，除私部門職員外，民眾多認為非軍公教者相較於軍公教者對於社會的貢獻度是較高的，儘管如此，民眾對於公校教師的評價仍為正向，皆認為教師對於社會的貢獻度是十分地高。由上述可知，雖然民眾認為非軍公教者的貢獻度是較高的，但在軍公教中，民眾對於各個職業類別的看法，仍具有顯著的差距。

表一 民眾對不同職業在「無貢獻/有貢獻」面向的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25 百分位	50 百分位	75 百分位
軍人	1118	5.90	2.24	5	5	7
公校教師	1128	6.31	1.81	5	6	8
公務員	1145	5.58	2.13	4	5	6
私部門職員	1121	5.75	1.79	5	6	7
農民	1138	6.89	2.07	5	7	8
勞工	1140	6.42	2.01	5	7	8

資料來源：林聰吉(2016)。

說明：本題採用 1-10 分的量表，分數越高則代表民眾認為該職業類別對於社會的貢獻度越大；反之，則代表民眾認為該職業類別對於社會的貢獻度越低。此外，上述資料乃分別依序詢問民眾對於軍人、公立學校老師、政府公務員、私人公司上班的職員、農民、工廠勞工等六種職業類別的看法。

至於，由表二分析結果可知民眾對於各職業別「受照顧程度」的認知，即民眾認為該職業類別者受政府所照顧的程度高低，與前者不同的是，民眾認為軍公教者是比較受到政府所照顧的一群人，其中又以公務人員最高（7.71 分），其次依序則是公立教師（7.42 分）與軍人（7.34 分）。相較之下，民眾認為非軍公教者受政府所照顧的程度則低於甚劇，依序為私部門職員（4.62 分）、農民（4.32 分）與勞工（3.93 分）。顯見，民眾多認為相較軍公教者，非軍公教者是比較沒有受到政府所照顧的一群人。

表二 民眾對不同職業在「沒受到照顧/有受到照顧」面向的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25 百分位	50 百分位	75 百分位
軍人	1134	7.34	1.96	6	8	9
公校教師	1136	7.42	1.77	6	8	9
公務員	1152	7.71	1.92	7	8	10
私部門職員	1133	4.62	1.91	3	5	5
農民	1145	4.32	2.29	3	4	5
勞工	1139	3.93	2.09	2	3	5

資料來源：林聰吉(2015)。

說明：本題採用 1-10 分的量表，分數越高則代表民眾認為該職業類別是相對較受到國家照顧的；反之，則代表民眾認為該職業類別較不受到國家的照顧。此外，上述資料乃分別依序詢問民眾對於軍人、公立學校老師、政府公務員、私人公司上班的職員、農民、工廠勞工等六種職業類別的看法。

綜觀上述，在貢獻度的部分，除私部門職員外，民眾多認為非軍公教者對於社會貢獻是較高的，但是與受政府照顧程度相比，他們卻是較不受到政府所照顧的一群人。反觀軍公教者，多數民眾則認為他們是國家特別照顧的一群人，但是，除公校教師外，民眾多認為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度是相對較低。上述資料已勾勒出民眾對於軍公教者與非軍公教者之間的態度差異，對軍公教者多偏向較負面的看法。

此外，為了更詳細瞭解影響民眾態度的主要因素，作者乃透過線性迴歸分析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 OLS）的方式來加以檢視各變項的影響力，結果顯示職業（軍公教/非軍公教）與政黨認同（泛藍支持者/泛綠支持者/中立）是影響民眾態度差異的重要因素，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詳而言之，軍公教者相較於非軍公教者，乃認為軍公教與非軍公教的差距較小，即軍公教者認為不同職業類別間的差距是較小的，不因職業類別的差異而導致明顯的差別待遇。至於，政黨認同此一變項則顯示，泛藍支持者相較於無政黨認同者，泛藍支持者認為軍公教與非軍公教的差距較小。相對地，泛綠支持者則認為軍公教與非軍公教之間存有極大的差距。此一結果也顯示了國民兩黨在軍公教議題上的不同主張，確實對於其支持者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是引導的力量，進而對於他們政治態度產生羈絆的效果。然而，必須說明的是，由於篇幅的限制，因此，本文則不多作說明。而除了上述量化資料的測量外，以下將藉由焦點座談的資料分析，以更深入地剖析民眾對於軍公教者的深層態度。

二、民眾態度的變化與分布

誠如前述研究發現，根據線性迴歸分析法（OLS）可知職業與政黨認同皆會影響民眾對於各職業類別工作者的態度與看法。因此，本文將以職業類別與政黨認同作為焦點座談的分類方式，冀以透過集體思考的方式，激盪出更多的想法與經驗。以下將說明民眾對於軍公教的態度變化，並針對其經驗、背景與形塑管道做更進一步地介紹。

（一）回溯過去，營造未來：民眾態度變化趨勢

社會因素與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在過去而言，民眾多認為軍公教相較於其他職業類別，是屬於相對「弱勢」的職業。當時時代背景的氛圍下，軍公教者的待遇並不如其他職業類別的民眾，僅可視為穩定、求溫飽的一份工作，甚至被視為是不具挑戰性的職業。但是隨著整個經濟環境的變化，許多社會制度並沒有與時

俱進，反而突顯出軍公教者的差異性，甚至成為政黨鬥爭的操作議題，左右了民眾對於政治議題的看法（Abramowitz, 2011），並成為民眾所批評的爭議問題。

...他們以前時空背景，早期是不好，薪水低，政府都不加薪。（中立 4A）

...父母會跟你講軍公教他的工作穩定，雖然待遇不是很高，可是他的工作穩定，日常生活還是過得去，但也不是說很富裕啦！那也是貧窮的唯一脫離辦法，當軍公教工作最穩定。（泛藍 5E）

軍公教這三個字基本上是從你的薪水體系出來的，國家的薪水都是軍公教、軍公教一直在強調，所以老百姓對軍公教刻板印象你們軍公教體系就是這樣的薪水、待遇，但是早期的軍公教老百姓是看不起軍公教的，尤其是軍人，你說女兒嫁給軍人打死不可能，好男不當兵。（泛藍 5H）

雖然多數民眾認為早期的軍公教是屬於較「弱勢」的職業，但因為社會背景的改變，經濟的不景氣與利率的驟降，反而突顯出了軍公教者薪水的穩定與待遇的優渥，造成現今民眾對於軍公教轉而偏向「敵意」的態度，認為他們是受到較「優渥」待遇的一群，使得軍公教者的地位在社會中有所轉變。

以前利息那個一般存款利息（18%）差不多，對軍公教而言，他待遇比較差，憑良心講，我是當老師，為什麼？沒出息才去當老師啊。那以前的那個利息比較高，跟人家 18%差不多，所以沒感覺嘛。那你現在經過時間經過那麼多年，幾十年利率一直是往下掉，那你 18%沒有改變，所以才變成現在的職業對立。（中立 3F）

...我印象中，台灣在經濟起飛的那個年代，我的大哥都問我：「你薪水多少？」我就說：「我多少。」，他就說：「你的待遇都不好。」可是後來台灣的經濟停滯了嘛，他變成反過來說：「你那麼好！還有退休金那麼好。」（泛綠 6F）

我覺得是社會背景的襯托，早期我對軍公教感覺都是相當辛苦。等到我自己長大，像我現在已經當老師，變成利益很好、很貪婪的一群，是被背景襯托出來我的感覺，可是事實上就像那個老師說的，我們享受的福利比早年的還不好，但是我真的覺得背景襯托起來，我們的待遇變得很好。（泛綠 6G）

(二) 瞭解當下，鑑往知來：民眾態度變化趨勢

因為社會環境的改變，民眾對於軍公教的態度已有所不同，更進一步來看現今民眾對於軍公教的看法，我們可以知道民眾對於軍公教的看法，主要可以分為經濟面、社會面兩個部分。就經濟面而言，軍公教被視為是一個穩定、安定與有保障的工作，其中又以退休制度的保障最為人所嚮往，因此，軍公教不但成為了「鐵飯碗」的代名詞，更成為許多民眾願意奉獻於軍公教的重要原因。而許多民眾對於軍公教的一般印象，不外乎就是「會讀書與會考試」等既定印象，當然，不可以否認地，透過筆試的選才方式有其一定優勢，有助於國家對於各界人才的網羅與篩選，然而，這種選才方式是否真的有助於國家培養出有熱情、有能力且願意為民服務的「公僕」乃值得我們省思，此一問題則有待日後研究再續作討論。

...軍公教早年非常地辛苦，然後隨著時代的推演，經濟的不景氣，所以現在軍公教就是所謂的鐵飯碗。(泛藍 1H)

我對軍公教的認識，就是好、安定、穩定、退休好、鐵飯碗。(中立 3G)

我是軍人子弟，那可以說我在小的時候我就已經有一個印象，對於軍公教感受到是一個勤奮、苦讀，而且應該是辛苦、沒有大志的奉公守法者，那通常來說呢，軍公教給我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可以吃公糧、鐵飯碗，然後將來、老來可以領月退。(泛藍 5B)

人想要安定的生活就是會擠破頭的想要考進去，反正考進去之後，你就不會有考核了，你應該就是可以幹到退休這樣了(中立 3D)

至於，就社會面而言，現今民眾對於軍公教的看法乃偏向較於負向，並認為他們是無所事事的「涼缺」，且在運作上充斥著官僚的氣息，更以「肥貓」作為其代表。而會造成此一現象，可能是因為公部門缺乏競爭機制，導致成員的效率不彰。同時，在缺乏有效的績效考評與淘汰機制的情況下，容易造成成員有「進去即可做到退休」的消極想法，降低他們對於工作的動機與熱情。故該如何穩定軍公教體系下運作的品質與效果，則成為我國政府人事改革的當務之急。

軍公教就是一個保障，你將來工作穩定，然後錢又領得多，可是就是你軍公教很難考，所以我一直覺得考上軍公教的人都很厲害，都是那種佼佼者。然

後就覺得說，他們好像領 18%好像似乎也是應該的，因為他很難考。所以我就說好像很多人都還是很嚮往說要去做公務員，因為就像我媽可能給我的觀念就是那就是薪水多，然後可能工作輕鬆，又可以穩定，你又可能不會被裁員之類的，就是比較保障的感覺。考試很厲害，考上就是涼缺了。(中立 3C)

...那個很官僚啊，你說是辦事員也好，行政人員也好，你要去領戶口名簿，他對你說缺什麼缺什麼，一次講一種，你要走三趟了，但你要講他官僚也好，其實就是很欺負老百姓。(泛綠 2G)

儘管現今民眾對於軍公教仍偏向較負面的態度，但是身為教師的受訪者 6D 也提到，雖然社會環境所給予的負面看法會影響民眾投身於軍公教的意願，但是在穩定職涯保障的考量下，即便充滿矛盾的想法，甚至是負面的評價，但多數民眾仍會努力爭取以加入該體系，使其內化為該體系的一員，而繼續享有圈內所擁有的保障與特權。

我覺得其實大家對軍公教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像我父母那個階層都覺得軍公教的福利都超好，但他們都很官僚、很保守，可是家庭裡面就一直很希望你進入這個體系。軍是不會啦，但是公教體系他會一直不斷的推動，像考大學的時候，你可以考上師範，但你選擇普通大學，沒有選擇師範大學就是不對了，在家裡就很大逆不道，你竟然放棄那個鐵飯碗，但你也會覺得這個工作沒什麼出息這樣。所以我覺得軍公教其實是複雜的，希望可以進入輕鬆的體系，可是又怕你變成跟他們一樣的那種形象。(泛綠 6D)

三、態度差異：測量與分布

時至今日，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印象已有所轉變，在討論民眾對於軍公教的態度與價值評斷時，還須考量到軍公教者不同的「貢獻度」。因為貢獻度的不同，自然醞釀出的態度也會有所差異，再加上本質上的差異性，因此，對於軍公教三者的印象不應一概而論。同樣的，由表一、表二的調查結果也正印證此種說法。故以下將分別針對軍人、公務人員與公校教師進行探討，以瞭解三者職業於民眾心中的形象與觀感。

（一）保家衛國：民眾對於軍人的態度分析

民眾對於職業軍人的態度與印象，在不同的政黨認同者間存有極大的差異，泛藍支持者多肯定軍人的辛勞與付出。相反地，泛綠支持者則對於軍人傾向於相對負面的看法，多認為在社會環境的改變下，軍人存在的必要性已有所降低。而中立支持者也多傾向於此種看法，導致軍人在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取而代之的則是負面的印象。

軍人非常辛苦，因為軍人通常都在外面，而家裡的軍人的妻子真的也是非常辛苦，一定要獨立，因為我身邊就有這種例子。(泛藍 1F)

軍人，我覺得如果以現在的環境來講的話，可能是比較沒有自由吧，都好像在營區裡面，勤務應該算是蠻多的吧。(泛藍 1G)

其實軍人...我覺得是比較辛苦的，那尤其是基層的，因為之前經過一些裁減之後，其實裡面的基層都非常辛苦，那也許將官還是不錯啦。裡面其實基層是過得很辛苦。(泛藍 1A)

儘管上述的泛藍支持者對於軍人給予肯定與正面的態度，然而，大多數的泛綠支持者與中立的民眾，則是在考量到社會環境後，對於軍人傾向於較不友善的態度，並建議政府需與時俱進以賦予他們新的任務型態，已符合社會需求。而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除了與社會環境改變、戰爭不再有關之外，近日國防部的「小白事件」^{††}，亦是導致大眾態度偏於負面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在媒體大肆報導下，短時間內迅速引爆民眾對於軍人的不滿情緒，造成國軍蒙上軍紀敗壞的批評，導致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大幅下降。上述結果，也與 Kimball and Gross (2007) 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大眾媒體的報導會影響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認知，並成為引導態度與行為的重要參考。同樣的，Shirky (2011) 亦指出網路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工具，民眾透過網路平台分享資訊，並形成網路上的輿論，在網路討論的渲染以及人際網絡的影響之下，會對於民眾的態度與行為產生間接的影響力。

^{††} 於 2016 年六月，國軍傳出集體虐狗（小白）事件，並將虐待過程的影片傳至臉書分享，而此一風波造成國軍蒙上「不尊重生命與軍紀敗壞」的批評。同時，也引起國人的眾怒，許多動保團體前往國防部抗議，要求國軍道歉並提出 5 點訴求。而在輿論壓力下，涉案軍人也拍攝影片向大眾表示道歉，並由部長馮世寬代表全體國軍出面向社會大眾道歉，以及允諾對於國軍體系進行全面改革（楊佳穎 2016）。

軍人他們其實在裡面應該制度好像也沒那麼好。有時候覺得他們領得是的薪水，人民的納稅錢，可是他們近期表現出來的觀感不是那麼好。(泛綠 2E)

因為現在軍人沒有打仗，國家應該安排一些事情給他們去做，不然太閒，我覺得我們當過兵都知道嘛，真的有時候是真的沒事幹。(中立 4B)

...現在也沒有打仗，然後就覺得軍人好像也沒有做什麼事情。(中立 4E)

...至於軍人，像是農家子弟並不鼓勵孩子去從軍、當職業軍人，因為基本上他們那圈子是外省圈子，你其實去那邊沒什麼好發展的，你不會有前途的啦。(泛綠 6A)

(二) 為民服務：民眾對於公務人員的態度分析

民眾對於公務人員的印象，除了工作本身的保障之外，不外乎就是效率不彰、官僚且不知變通的負面印象，甚至認為在公部門服務模式的改變下，承辦事務將會有所減輕，反而造就了一些「肥貓」公務人員的產生。值得注意的是，由民眾對於公務人員的看法中可知，上述文中對於軍公教「整體」印象的表現，大致與對公務人員的「個別」印象不謀而合。顯見，在民眾形塑出「以偏概全」的印象之過程中，乃受到公務人員的影響甚劇。此一結果顯示，若政府欲致力於創造出對軍公教者友善的社會環境，對於公務人員的制度、風氣與文化改革勢必成為我國改革的首要任務，以創造出友善的社會氛圍。

...考這個職務考上之後，我就是一份穩定的工作，穩穩的坐到退休。但相對的話，我會覺得公務人員他們進去，因為他可能考進去了，他會覺得就是我們上班我能做到退休，但這方面，他可能會因為薪資比較穩定，會穩定地成長。可是相對我考進來了，他就會缺乏一些競爭性，就是一個穩定上下班的工作這樣子。(泛綠 2E)

那公的話，其實就還是比較多「肥貓」，比較多不做事的，那尤其是現在的公來講，很多事情都外包，譬如說，機場捷運，那麼就會有更多不會做事的「肥貓」。(泛藍 1A)

在我幼年接觸裡面，會比較感覺到他是一個墨守成規，然後是一種官僚架構，就好像不太容易有一些變通的過程，裡面公務人員本身服務態度的過程當中，的確是有官僚的那種氣息。(泛藍 5B)

儘管公務人員承受許多負面的刻板印象，然而，許多民眾指出陳水扁當市長時期（1994 -1998 年），公務人員整體的態度與服務具有明顯的改善。透過一系列制度的改變與監督機制，引導公務人員的行為改變，落實社區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精神。具體措施包括降低櫃檯高度^{††}、提供坐位和茶水等服務，並以突襲方式檢查市政府局處的出勤狀況，透過一系列的行政革新，改變傳統效率不彰、態度不友善的情形（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2006）。

而此一行政革新，對於內部制度與外部顧客皆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力，對於內部制度而言，公部門納入「顧客至上」的精神，並成為亞洲第一個獲得國際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9002 的認證^{§§}，透過制度化的方式維持運作的品質與流程，改善傳統行政僵化的問題。對於外部顧客而言，許多民眾也抱持著肯定的態度，對於公務人員的態度也有漸漸地轉向較友善的看法，顯見，行政革新的效力對於公部門的組織文化，具有一定的規範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敵對政黨的支持者（泛藍支持者），對於屬於民進黨之陳水扁市長的行政改革，也傾向支持與肯定的正面態度，此一結果也肯定了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理性思考，更可作為政府改革的重要借鏡。

我也覺得累的很累，輕鬆的很輕鬆，所以變成就是很極端。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高階的，沒看到那些低階的公務人員在那邊辛苦，挨罵的都他們，出錯都是他們扛，所以我覺得現在年金你要改革，或者是你要怎樣，對公教人員的話，我覺得不要以偏概全，尤其是阿扁那時候，我不否認他真的把公教人員、公職人員的態度改變了，改變得蠻好。(泛藍 1G)

...以前對軍公教人員的部分，大部分有一點威嚴的感覺，去那個戶政事務所或鄉公所辦事的時候，蠻常見的是他們臉色都不太好，很常見的是他們明明

^{††} 過去的行政櫃台高達 120 公分，因此，造成民眾與公務人員之間的溝通不易，辦公民眾也無法得知櫃台內的處理情況，容易產生「混水摸魚」的狀況。而陳水扁市長則提倡降低行政櫃台為 75 公分，讓民眾與公務人員能更易於溝通，落實為民服務的精神。

^{§§} 國際 ISO 9002 的認證即「質量體系生產安裝和服務的質量保證模式」，乃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所制定出一系列之質量保證的審核標準，並同時經由公正的第三方認證，所給予組織的品質保障的認可。

是公僕，但我們去的時候都要拜託他們，還要看臉色。比較具體的是我不是那麼完全地認同阿扁，但以他做這件事情，那個叫做櫃檯，戶政事務所的櫃台很高的，所以我們去的時候要等他，你可能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後來，所有櫃台降低下來，然後才有一個很具體的改變，變得比較親民、比較好。（泛綠 2D）

其實當時的媒體會去拍嘛，阿扁上班就是會去巡，譬如說，4 點多誰不在位子上。那時候長輩就會說：「以前我去區公所找人都找不到，要等很久，現在還有水跟號碼牌差很多啊！」。（泛綠 2A）

（三）春風風人：民眾對於教師的態度分析

誠如古人所云：「為學莫重于尊師。」民眾對於教師的評價皆抱持著正面的態度，並肯定其辛勞與付出，將教師視為社會地位高的族群，與前述軍人和公務人員的結果有明顯的不同。雖然社會氛圍有明顯的改變，相較於傳統，民眾多較寵愛自己的孩子，甚至造就蠻橫無理的「怪獸家長」出現，但儘管如此，多數民眾對於老師的尊重仍並無減少，皆肯認他們的辛勞付出，而此一結果也與表一的分析結果符合，對於教師的貢獻度表示肯定。這可能是因為教師被賦予教育的天職，故往往較受人敬重，此外，除了家庭外，學校大多是民眾第一個所接觸的外在場域，扮演著政治社會化之重要管道，為多數民眾所必經的經歷，故經過該場域的薰陶下，往往會塑造出較正面的評價與態度（陳光輝、蔡奇霖，2010）。

教師的話，一般的刻板印象就是他們的身份地位會稍微比較高，因為畢竟是老師。（泛藍 1F）

...軍公教中，我覺得最辛苦的應該是教育人員。（泛藍 1G）

那教的話，因為現在教育其實變化很大，那就變成是很多怪獸家長，那老師其實很辛苦。（泛藍 1A）

...老師也很辛苦，小學老師、國中老師、高中老師，小學老師是最重要也最辛苦的，小朋友一進來都不懂，你要導正他好好教，國中是最亂的，再來才高中，比較難教，老師很辛苦（泛藍 5 H）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社會大眾給予教師相當正面的評價，也肯定他們的貢獻與辛勞。但是身為受訪者的三位教師，則指出社會風氣的改變下，家長壓力的加劇與學生型態的改變，反而使他們的地位被明顯地被矮化，感覺較不被受到尊重，更感受到師道日微的無奈與感慨。換而言之，雖然一般民眾認為他們對於教師給予極高的評價與尊重，但老師卻感受到師道日微的困窘，究竟為何第一線教育人員與一般大眾的看法會如此迥異，則有待日後做更進一步地探討。教師不只扮演著專業知識的教授，更扮演著人文教育的重要責任，而身為第一線的教育人員，卻對於現今教育體系感到擔憂，以及對教育產生無力感，實在值得我們省思，而該如何創造出友善的教育體系，並給予辛苦的教育人員一個尊重的態度，則值得社會大眾一同努力，以在家長、學生與教師之間共創和諧的環境。

因為我自己是教師，教師在以前我可以說雖然薪水不是高，可是那時候尊師重道，社會地位、價值高的，因為社會價值給老師的評價是高的。但是近年慢慢師道日微，很多層面對老師可能期望很高，但是卻在很多地方沒有辦法跟尊師重道相結合，所以在目前來講，教師的確在有些時候..媒體會說教師可能不如屁孩，當然這是一個很沉痛的一種轉變。(泛藍 5 B)

說句實話，現在老師沒有以前這麼好當，將來教官全面退出校園，會更難當，為什麼我會想當高中老師，就是因為有教官在，至少教官穿了軍服以後壓的住學生，那老師就可以放心去做教學的工作。那國中為什麼最難帶？大家不想去國中，我以前去實習的時候，打開學務處的門，一個椅子就丟過來，誰丟的？學務主任丟的耶！他在跟學生幹架，因為我們學務主任是退伍的軍人再去考老師，為什麼找他當主任？因為他鎮的住學生。...所以變成教育的亂象，以後誰還來接生教組長，沒有人要接阿！(泛藍 5A)

教師跟我小時候有沒有不一樣，我小時候老師是可以處罰人的，現在我的兒子是都不能處罰，再頑皮，老師最多只能請家長來討論，不能動到任何處罰工具，不然我就要告他，家長可以告學校、告老師、告教育局，現在風氣是不一樣，導致老師在不同的情況下都被矮化了。(泛綠 6A)

四、政治態度的形塑過程

藉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民眾對於軍公教者的態度與評價，源於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之中，除了民眾本身的親身經歷外，不外乎就是可歸於家庭、學校、朋友與大眾媒體。首先，對於家庭而言，依賴性的影響之下，父母經常在教養過程中，灌輸特定資訊，使孩子無形中接收了父母的態度與想法，造成政治價值的穩定延續（De Graaf and Kraaykamp, 2000；吳乃德，1999）。許多受訪者也表示他們會選擇奉獻於軍公教，很大因素即是父母從小所灌輸的想法，即便知道社會給予的負面批評，但在父母的勸說下，仍會選擇任職軍公教，而對於軍公教的負面觀感，也多來自於父母的灌輸。學校與朋友的影響力，雖然不如前者，但因為身邊朋友的討論與分享下，同儕壓力左右了民眾對於軍公教態度與想法，更成為影響民眾認知的重要參考。而學校則是大多民眾接觸教師的重要管道，除了透過實際的接觸所形成的認知外，在教育體系中，往往藉由教學而影響民眾價值觀，並冀以在兼顧知識與人文學習下，培養出尊師重道的莘莘學子。最後，在大眾媒體的部分，電視、報紙與網路交織而得的資訊傳遞的網絡，則成為現今政治社會化重要的工具，大眾媒體之傳播雖然無法對於原有的態度進行辯證與改變，但是卻扮演著強化民眾原有態度的效果（Dawson and Prewitt, 1977），成為公共事務的重要媒介。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受訪者皆認為，造成現今軍公教形象嚴重低落的重要原因，大眾媒體責無旁貸，受訪者曾表示：

軍公教為什麼現在形象比較低落，其實跟我們社會的氛圍跟媒體的文化是有關的啦！以前的，我們小時候的媒體是記者去跑新聞，現在是看爆料公司在做新聞，所以他一定是取負面的東西做為他的新聞，正面的他沒什麼好敘述的，以前我一個老師跟我講，那個時候是在蘋果日報實習，他說：「狗咬人不稀奇，人咬狗才稀奇。」他要報人咬狗的新聞，就是說這是一個風氣才造成現在軍公教汙名化這樣子。（泛綠 6A）

回歸於我國的媒體運作，現今傳統媒體傾向以便捷的方式，從網路社群直接找尋新聞的素材，對於消息來源與內容缺少篩選與過濾，網路社群的按讚數和圖文的誇張性反而成為傳統媒體所評判的標準（洪雅慧，2009）。甚至藉由扭曲原意與斷章取義的編輯方式，將實質的政治訊息引導到錯誤的方向，而導向賽馬式的競爭及個人化、八卦化、綜藝化、戲劇化的發展，而忽略實質的政治信息，喪失傳統媒體最初報導真相、提供資訊與監督政府的功能（林聰吉與王淑華，2007；陳方隅，2014；彭芸，2003）。在此種情況下，媒體過度負面的報導容易加深職

業間的對立，並流於「以偏概全」的謬誤中，形塑出不友善的社會環境。該如何解決媒體負面的影響力，以及停止擴大「汙名化」的渲染，則是我們所必須一同努力的重要目標，以營造出對軍公教者友善的職場環境，共創社會的和諧發展。

伍、結論與建議

綜觀本文分析可知，客觀性的量化分析已勾勒出民眾對於軍公教者與非軍公教者之間的態度差異，很遺憾地，本研究也驗證了民眾對於軍公教者多偏向較負面的看法，多認為他們是屬於國家較照顧的一群人，但對於社會貢獻度則相對較少。若更進一步來看，民眾認為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傳統社會背景下，軍公教者多屬於較「弱勢」的一群人，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相關制度缺乏與時俱進，在背景的襯托下，反而突顯出軍公教者所受到的優渥待遇，更導致了社會上的職業對立與不理性的批評。具體而言，民眾對於軍公教三者的態度仍具有顯著的差別，以軍而言，泛藍支持者較偏向正面的評價，反之，泛綠支持者則不然，顯見，政黨認同對於民眾政治價值判斷的影響力。有趣的是，民眾對於公務人員的印象雖偏於負向的態度，然而，許多民眾仍是對於陳水扁擔任市長時期，所施行一系列的行政革新給予正面的肯定，並漸漸改變既有的態度，對於公務人員的態度有所好轉。至於，在教師的部分，尊師重道觀念的盛行之下，如同量化資料，民眾對於教師皆給予較高的社會評價，並肯認其付出與辛勞，但身為第一線的教育人員，卻感受到師道日微的無奈，此一問題乃值得我們省思。

而民眾上述的態度與想法，多源於家庭政治社會化的效果，許多受訪者受到父母所灌輸的想法，即便知道社會給予的負面批評，仍會選擇任職軍公教，造成政治態度與價值的穩定延續（De Graaf and Kraaykamp, 2000；吳乃德，1999）。而學校與朋友的影響力，雖然不如前者，但亦是影響民眾認知的重要參考。值得注意的是，大眾媒體所產生的影響力乃不容小覷，資訊科技的傳播之下，不只傳統媒體能夠達到價值分享與加強的效果，網路媒體更成為引導意見的重要參考，然而，現今大眾媒體對於消息來源與內容缺少篩選與過濾，並以追求個人化、八卦化、綜藝化、戲劇化的報導方式為主，以爭取較高的商業利益，過度強調職業間的對立與不平等，而流於「以偏概全」的謬誤中，導致民眾對於軍公教產生敵意的看法，是現今軍公教形象嚴重低落的重要原因，雖然大眾媒體責無旁貸，但該如何塑造出友善的社會環境，則是大眾應努力共同目標。

民眾對於軍公教的印象，往往受到公務人員的形象所影響，但事實上，三者職業類別不只在本質上具有差別，同時，民眾對於他們的態度仍有所不同，故對於軍公教年金制度的改革，也不應該一概而論。儘管不同職業工作者對於社會的貢獻有所不同，也享受到不同的利益，但是，不可否認地，社會上不同職業的工作者，對於社會都有其一定的付出，該如何減少個人的偏見與認知，則有賴大家的理性思考與尊重，以停止擴大「汙名化」的渲染，營造出對友善的職場氛圍，共創社會的和諧發展。

而本文透過量化資料與質化分析配合的方式，雖能在問卷資料外，做更深入地探討，已剖析民眾更深層的想法與態度的形成。然而，由於成本因素的考量下，本文並未針對軍公教者的工作年資、官等與相關背景納入討論，此外，本文進行焦點座談的調查時間為八月中下旬，然軍公教大遊行乃於九月三日所舉行，而此一遊行，對於民眾態度與看法勢必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若能於不同時間點分別舉辦，相信必定會對於民眾態度有更深入地瞭解，並且更進一步探究公民活動所生的影響力。由於本文僅是對於民眾態度做初探性的研究，無法完全代表全體民眾的政治態度，但研究結果除了可以提供學術上的佐證，以對於軍公教的形象做更進一步釐清，降低以偏概全的錯誤思維。在時間及成本的許可下，日後若能將軍公教者的工作年資、官等與相關背景納入討論，以及透過追蹤調查（panel）的方式做長期的調查，相信必定能更深入瞭解我國民眾心中的軍公教形象，以及相關變數的影響力。冀以減少負面印象與「以偏概全」的謬誤發生，創造出友善的社會環境，並對於軍公教者給予最誠摯的尊重與感謝。

參考文獻

I. 中文部分

- 左宗宏 (2008)。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傳統媒體、公眾與網路討論議題之關聯分析。《傳播與管理研究》，7：73-106。
- 吳乃德 (1999)。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3：1-23。
- 林聰吉 (2016)。精英動員與大眾政治態度的形塑：台灣民眾心目中的「軍公教」形象。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編號：MOST 104-2410-H-032-026-MY2)，未出版。
- 林聰吉與王淑華 (2007)。台灣民眾政治知識的變遷與來源。《東吳政治報》，25 (3)，93-129。
- 洪美仁與黃建實 (2007)。反官僚現象—以公務人員相關之頭版新聞報導為分析素材。《臺灣民主季刊》，13 (3)，45-92。
- 洪雅慧 (2009)。北、高網路選民大不同？—媒介使用、媒介重要性評估與政治犬儒主義、投票行為之關連性研究。《東吳政治學報》，27：1-45。
-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2006)。《臺灣奇蹟推手——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紀念文集 第一輯》。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陳方隅 (2014)。負面競選的「好處」：讓中立選民不願意投票，選戰回歸基本盤—看顏色投票，2016 年 10 月 24 日，取自：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84219/>。
- 陳光輝、蔡奇霖 (2010)。學校教育與政治社會化：教育程度與自我認定的關聯性。《台灣政治學刊》，14 (1)：55-103。
- 陳陸輝、黃信豪 (2007)。社會化媒介、在學經驗與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東亞研究》，38 (1)：148。
- 陳敦源 (2009)。《民主治理—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調和 (第一版)》。台北：五南。
- 傅立葉 (1994)。台灣社會福利體系的階層化效果初探。載於伊慶春 (編)，《台灣民眾的社會意向：社會科學的分析 (頁 285-310)》。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彭芸 (2004)。我國大學生的媒介使用、社會資本與政治信任對象之關連性研究。《新聞學研究》，79：91-133。
- 黃耀滄 (2008)。我國年金制度發展初探。《台灣勞工季刊》，14：24-32。
- 楊佳穎 (2016)。向「小白」獻花！群眾圍國防部 2 小時 馮世寬二度出面，2016 年 10 月 24 日，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628/724928.htm#ixzz4UbmRundh>。

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 (2016)。軍公教反污名要尊嚴九三大遊行，2016 年 10 月 24 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39682729669566/>。

劉嘉薇與黃紀 (2012)。父母政黨偏好組合對大學生政黨偏好之影響— 一定群追蹤之研究。 **臺灣民主季刊**，9 (3)：37-84。

鄭宏文 (2011)。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以我國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為例。 **復興崗學報**，101：67-96。

II. 英文部分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ance and Alexandra Segerberg.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ffee, Steven. H. (1972).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the Family: Implications for Adaptability and Chang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Connover, Pamela J. (1991).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Where's the Politics. In William J. Crotty(ed.), *Political Science: Looking to the Future Vol. 3* (pp. 125-52).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and Donald D. Searing. (2000).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Lorraine M. McDonnell, P. Michael Timpane and Roger Benjamin. Lawrence, *Rediscovering the Democratic Purposes of Educa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Dawson, Richard E., and Kenneth, Prewitt. (197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De Graaf, Nan D., Paul M. De Graaf, and Gerbert Kraaykamp. (2000).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2), 92-111.
- Goodsell, Charles (2003). *The Case for Bureaucracy: A Public Administration Polemic (4th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Graber, Doris A. (2006).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CQ Press.
- Harvey, Ted G. (1972). Computer Simulation of Peer Group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Political Behavior: An Exploratory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570-602.
- Hubbell, Larry (1991). Ronald Reagan as Presidential Symbol Maker: The Federal Bureaucrat as Loafer, Incompetent Buffoon, Good Ole Boy, and Tyrant.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1(3), 237-53.
- Hyman. Herbert.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Ichilov, Orit (2004). *Political Learning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under Conflict: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Youngsters*. London : Routledge.
- Jaspers, Eva, Marcel Lubbers, and Jannes de Vries. (2008). Parents, Children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Long Term Socialization Effects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9(1), 39-58.
-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68).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From parent to Chi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 169-184.
- Kimball, David C., and Cassie A. Gross. (2007). The Growing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Voters. In John C. Green., and Daniel J. Coffey. Lanham, *The State of the Parties: The Changing Rol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arties*. Maryland: Rowman& Littlefield.
- Kraus, S., & Davis, D. (1976).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on Political Behavior*.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angton, Kenneth P.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Jeremy D., and Heather M. Schmidt. (2004). Gendere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Four Contexts: Political Interest and Value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Japa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1: 393-407.
- Mishler, William and Richard Rose (2007). Generation, Age, and Time: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Learning during Russia's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4), 822-34.
- Shirky, C. (2011).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Foreign Affairs*, 90 (1), 28-41.
- Suleiman, Ezra (2003). *Dismantling Democratic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edin, Kent L. (1980). Assessing Peer and Parent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1), 136-54.
- Westholm, Anders and Richard G. Niemi. (1999).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1), 25-41.
- Zuckerman, Alan S., Josip Dasovic, and Jennifer Fitzgerald. (2007). *Partisan Families: The Social Logic of Bounded Partisanship in Germany and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